



主辦機構：香港作家聯會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
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特稿】■ 在混沌的光明中，字開成花 ●潘耀明

編按：著名當代作家、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安憶於一月二十六日獲嶺南大學頒授榮譽人文學博士，以表彰其在文學及教學領域的卓越成就，以及對社會福祉作出的重大貢獻。本版主編潘耀明參與盛會，見證光榮時刻，回憶四十多年深厚交誼，倍感欣慰，並衷心致敬。另二人之前還在港有一深入對談，從一九八三年共同參與的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說起，談到令人深刻的旅行經歷，以及今日的香港和香港文學，一起刊出以供賞讀。

「簡樸的生活其實是清醒的生活。一日一日為生計的勞動，四肢軀幹伸曲着沉思默想，同時種植下果腹與餵養精神的口糧，外部與內部的生活存於一體。但這是理性的有光明的混沌，不是暗中的蒙昧。」（《明報月刊》二〇〇一年四月號〈人生小語〉）——讀王安憶這段文字時，我總覺得，這不僅是她對生活的註解，更像是一把鑰匙，輕輕旋開了時間的鎖，讓我們得以走回那個愛荷華的秋天，走回文學最初讓人顫動的瞬間。

一九八三年，愛荷華河的水流得格外緩慢，彷彿為了讓我們這些從世界各地飛來的文字候鳥，能將倒影看得更分明些。那是我與安憶初次相識的季節。美國中部的腹地，小鎮寧靜如沉睡而溫馴的嬰兒，將我們這些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乃至牙買加、巴勒斯坦、南斯拉夫的三十多個國家與地區的筆耕者，結繫在一段超越地域政治的時光裏。對安憶而言，那是眼睛來不及看的新世界；對我而言，那是一場新知舊雨與文字交織的盛會。在五月花公寓共用廚房的煙火氣中，我們燒中國菜，在保羅·安格爾、聶華苓「安寓」的壁爐熊熊火光中，敞開襟懷，煮酒論英雄，暢談文壇上的逸聞趣事。物質的豐裕像一場突然的雨，淋濕了從匱乏時代走來的人，敏感的安憶的雙眸，總能穿過超級市場貨架的光澤，看見更深處的東西——那是對生活本身孜孜不倦的沉思與默想。

那是超出世態俗譽的混沌！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聲音在此交匯，語言的叢林中，意識形態的藩籬曾讓東西德的作家愛恨交織、跳河相脅，又於離別時擁抱哭泣，依依難捨，其情狀令人低徊不已。憶起安憶與台灣留學生在異國的雜貨店裏，因一句「我們握手吧」而心潮澎湃時，可見文學所構築的空間，早已超越了地理與政治的劃分。它是一片理性的光明之地，允許所有的差異在對話中顯影，讓人在混沌中辨識出人類共通的脈搏。相信安憶便是這樣一位沉靜的辨識者。她將所見的豐裕與開放、衝突與和解，都內化為精神的糧食，成為她筆下的養份。

此後她在德國的小鎮廣場上享受寂寞，在教堂與墓地間漫步，將異國的寂靜熬成《旅德的故事》；她在香港匆忙的街市中，尋得教學之餘的悠閒，看電影，看演出，安

靜地觀察這座城市「貼地、生動且不失溫度」的文學萌芽。她難能可貴之處，總是能將最樸素、甚至寂寞的日常，點石成金般化為筆下帶着血肉的文字。這便是她題寫的「字所到處，開出花來」——文字不是懸浮的靈感，而是深深扎根於一日一日的辛勤與沉思，從生活的土壤裏汲取養份，最終綻放出的，是如《長恨歌》般一座城市的史詩，是如《啟蒙時代》裏在精神挫敗中積攢的勇氣，是如《紀實與虛構》中一次恢弘的文學實驗，也是如《一把刀，千個字》中跨越紐約、上海、東北的命運浮沉。

從愛荷華河畔那個約定「十年後再會」卻各自飄散的年輕作家，到今日嶺南大學榮譽博士學位袍加身的文學大家，安憶走了一條漫長而堅實的路。她將國際的視野與中國的經驗熔於一爐，在自由思想的原野馳騁，成為一個真正的受廣大讀者愛戴的作家！她的十七部長篇、數十部中篇、逾百篇短篇，以及那些讓張愛玲筆下人物在舞台與銀幕重生的劇作，猶如一路播撒的種子，已在世界各地譯成多種語言，開

出繽紛的花朵。然而，無論走得多遠，榮譽多高，她從未離開過內在的那個「簡樸生活者」，那是她創作的源泉。寫作於她，依然是那「伸曲着沉思默想」的勞動，是同時餵養肉身與精神的耕種。

爾今，見證她獲此殊榮，讓人彷彿又看見愛荷華的秋陽，透過樹梢，灑在緩緩流淌的河面上。最好的時代或許隨創辦人安格爾與聶華苓的退休而被人懷念，但文學的傳承從未間斷。安憶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傳承的證明；她將那份國際寫作計劃中獲得的開闊與包容，帶回了復旦的課堂，帶給了香港的



▲榮譽博士頒授典禮上王安憶與一眾到場支持的友好合影。前排坐輪椅者為李歐梵，蹲者是李歐梵曾指導的博士生趙傑鋒；後排從右到左：王安憶丈夫李章、潘耀明、蔡嘉蕪、鄺秀、鄭培凱、王安憶、李玉瑩、許鞍華、甘琦、劉韜、李樂詩。（潘耀明提供）

學子，也織入了每一行她寫下的句子裏。她讓我們知道，真正的創作源自對生活清醒的愛，即便身處喧囂時代，內心仍需保有一片寂靜而自由的淨土。在那裏，思想可以自由散步，文字得以自然生長。

作為當年曾一起在愛荷華河畔漫步的人，對安憶獲得的殊榮，深感欣慰。我們謹在這裏，對一位傑出作家表示衷心的致敬，也是對那個照亮了共同來路的「光明混沌」的致意。願我們都能在簡樸的生活中保持清醒，在文字的耕種中期待花開。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榮譽總編輯、本版主編。）



▲著名當代作家王安憶獲嶺南大學頒授榮譽人文學博士，潘耀明（左）在現場與王安憶及其丈夫李章合照。（潘耀明提供）

字所到處 開出花來——王安憶與潘耀明對談 ●傅曉

知名小說家王安憶二〇一八年上半年來港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訪問教授，在此期間，與時任《明報月刊》總編輯兼總經理、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會長、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有一次豐富而趣味的對談。跨越記憶的時空，兩人從一九八三年共同參與的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簡稱IWP）說起，談到令人深刻的旅行經歷，以及今日的香港和香港文學。

愛荷華，眼睛來不及看

享負盛名的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是由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及華人女作家聶華苓於一九六七年創辦。一九八三年，潘耀明、王安憶及同期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在美國愛荷華小城，共同度過了三個月的寫作時光。當時的作家們都住在五月花公寓，兩個人共用一個廚房，是大顯廚藝的時候，潘耀明經常會燒幾道中國菜，為同處異國他鄉的大家打打牙祭。

對第一次出國的王安憶，又是另外一番心態，和母親茹志鵲一同應邀前來，她心裏的打算是什麼也不幹，就去看看美國。「國際寫作計劃」完成後，她們其後又到美國東、西岸講演和旅行。在她形容，「眼睛來不及看」，當時國內超級市場、高速公路、五星級酒店都沒有，可口可樂要用外匯券去買，小鎮上的每一件事，都讓她覺得很新奇。母女倆將所見所聞都以日記形式記錄下來，一九八六年出版了《母女同遊美利堅》，當時覺得很瑣碎、沒有提煉的記錄，現在看來，卻覺得很值得很真實。王安憶在之後的訪問中也直言道：「美國的豐裕、開放，對於經歷過匱乏時代的我們來說，不產生迷戀是很難的。」但她也漸漸明白了，豐盛的物質沒什麼了不起，光有物質是不會使人幸福的。

潘耀明說：「印象最深刻是要離別的時候，我們那群作家在愛荷華河畔散步，說起十年之後在

愛荷華再會一次，一位台灣留學生說，如果十年之後再會一次，肯定大哭一場。結果十年之後只有我一個人回去了。」

王安憶說，我十八年之後回去了。潘耀明：「你晚了八年。」大家忍不住笑了起來。

多年後，王安憶、潘耀明趁不同的機會回到愛荷華，相對於大世界迅速的腳步，愛荷華這個美國中部腹地的小鎮，行走得緩慢許多，好像未曾變過。而在當年作家的眼底，隨着保羅·安格爾、聶華苓退休，最好的時代已經過去。

文學交流 跨越地域紛爭

第一次出國的王安憶，在這裏有數不清的「第一次」體驗，不僅是大開眼界，更有機會接觸到全世界各地優秀的作家。在王安憶和潘耀明的憶述中，同期有來自三十多個國家的作家，牙買加、尼日利亞、土耳其、墨西哥、巴勒斯坦、印度、印尼、菲律賓、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外貌、性格各有特點，巴勒斯坦的女作家很漂亮，牙買加的女作家特別高挑，南斯拉夫的女作家每天拜神，以色列作家看到巴勒斯坦作家在，第二天就走了。

最戲劇化的是東西德作家的故事，兩人原本是在東德青梅竹馬長大的朋友，女詩人也是東德人，逃到西德，卻對西德資本主義的社會非常不滿意，故而沉迷於非常頹廢的抽煙、酗酒。所有作家一起分小組的時候，西德作家應該歸為「西歐組」，但她自己不願意，而「東歐組」又不接受她，說她是叛徒，分組的那天晚上，她竟然跳河了，直接跳到愛荷華河裏。而在離開的時候，東西德作家又擁抱在一起，哭的一塌糊塗。原來發展到後來他們倆已經滋生了感情，難分難捨！

一九六七年創辦的「國際寫作計劃」，早期參與計劃的華語作家以台灣作家和香港作家為主，接近八十年代，中國內地作家才開始參與到這個計劃。那時候內地和台灣的作家相見，會是怎樣的場景？王安憶表示，很好奇。潘耀明的第一反



▲▼王安憶（左）與潘耀明於香港對談並合影。（傅曉攝）



應是——很激動。王安憶說：「我在愛荷華的時候，有次在一個韓國雜貨店，來了兩個台灣留學生，聽說我是大陸來的，非常激動，跟我說，我們握手吧。」

享受寂寞

王安憶認為自己是個「旅遊不太活躍的人，寫過一些旅遊方面的文章，卻沒怎樣寫過嚴格意義上的遊記」。除非有特殊的見解或強烈的感觸，否則她少寫遊記，稱得上「遊記」的，是曾遊訪德國後寫下並結集的《旅德的故事》。

寫作、旅行、生活，王安憶都能夠享受寂寞。在德國，有次去一個靠近荷蘭的小鎮呆了七天，小鎮很寂寞，一個小廣場，一個教堂，街道放射出去，就是這裏的生活，每天在房間寫東西，

在廣場上走一走、坐一會兒。她說，在國外的時候，教堂和墓地是經常去的地方，教堂莊嚴而華麗，墓地很漂亮，好像一個雕塑博物館。

德國給她的印象很深刻。上世紀八十年代，德國已開始出版王安憶的著作，因此，她多次前往德國，她認為，德國人是一個很有遠見的民族，對中國充滿好奇，對中國文學也是最有眼光，早在七十年代，就培養一些漢學家在北京學習，八十年代之後，就有漢學家很積極翻譯中國的作品，張潔的小說《沉重的翅膀》被翻譯成德文，得到很好的響應。

香港的悠閒與寂寞

這次是王安憶在香港住的最長的一次。香港人生活忙碌，而她卻樂於享受這座匆忙城市中的悠閒與寂寞，帶來未完成的作品，卻不會強迫自己寫作，教書、寫作之外的時間，便去看場電影，看場演出。王安憶是一個觀察者，外界喧嘩，她卻安靜，彷彿很寂寞很平淡很質樸的生活點滴，卻會帶來深刻的感受，化成動人帶着溫度的文字，正如她為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的題字——「字所到處，開出花來」。

她喜歡香港學生，他們有責任感、很懂事，對人不是那麼熱情，很羞澀，但是感情很深厚，香港的學生創作上「很感性，創作題材往往從身邊人事中得來，貼地、生動且不失溫度」。

第一次來香港是一九八三年底，多年過去，在她看來，香港的文化生活比以前富裕了，演出、藝術界等活動豐富多彩，至於香港的本土文學，王安憶認為「不可不視」，本地的文學愛好者們不斷辦刊物、搞活動，呈現出一番蓬勃的氣象。潘耀明表示，我們香港作家聯會及我們組織的幾個文學社團除了辦了文學刊物，也經常組織文學講座、開展文學交流活動，這些都是在民間進行，得不到有關方面的支持！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理事、字遊網執行編輯。）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評論】中國的「李爾王」與人類的一九七九

——「不可思議」的家族史詩《「李爾王」與一九七九》

——伍東林

編按：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五日，《洛杉磯書評》(LARB)推出題為〈李爾王走向中國〉的訪談文章，薛憶馮的長篇小說《「李爾王」與一九七九》再一次閃現於國際視野。這部四十萬字的「家族史詩」於二〇二〇年由《作家》雜誌分三期連載之後，迅即獲得華僑華人「中山文學獎」評委會大獎。其後五年間，這部作品觸發約三十篇、合共逾三十萬字的文學評論，更引起西方媒體和學者關注，相關評論現已由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完成精選編輯。這部作品雖然仍未有單行本面世，但已成為近年中國文學界備受關注之作。在本文中，作者探討這部小說如何透過家庭悲劇審視特殊年代的價值顛倒與個體創傷，並將《李爾王》昇華為探討尊嚴與救贖的普世寓言。

在當代中國文學的版圖中，薛憶馮始終以沉靜而銳利的姿態矗立於喧囂之外。他既是語言的煉金術士，精雕細琢詞句的質地與重量，又是歷史的沉思者，執著於在時間廢墟中打撈被遺忘的個體記憶。長篇小說《「李爾王」與一九七九》並非簡單記錄傷痕或歌頌「改革開放」，而是在東西方文明交匯點上，重新審視中國現代性轉型中個體命運的「家族史詩」。它以文學的方式，將私人記憶昇華為公共歷史的寓言，讓一段被遮蔽的歲月重獲敘述的尊嚴。

這部作品巧妙地將莎士比亞悲劇《李爾王》的內核與中國特定的歷史年份「一九七九」並置，構建出一個充滿張力的複調空間。「李爾王」不僅是一本在特殊年代被禁錮的西方經典，更成為衡量人性尊嚴與精神自由的隱秘尺度；「一九七九」也不僅是一個政治轉折符號，更是人類精神經歷漫長嚴冬後，試圖重新尋找「回家」之路的共同寓言。薛憶馮以此完成對歷史的詩性重寫——不是以史家的冷靜，而是以作家的悲憫。

被置換的祭壇：從王權解體到家族崩塌

薛憶馮的敘事智慧在於，他並未直接書寫宏大政治運動，而是借《李爾王》的悲劇結構，將國家層面的權力更迭置換為家庭倫理的崩塌。小說中的「父親」形象，原型取自作者外公：一位受過西方教育、在時代洪流中被錯劃為「地主分子」的知識分子。他的命運與莎士比亞筆下的李爾王形成深刻互文：李爾因分國失權，導致家庭與國家的雙重混亂；而小說中的父親則因歷史「誤讀」被剝奪家庭權威，淪為政治邊緣的沉默者。

這種「退位」是一場被動放逐。他手中那本幽靈般的英文版《李爾王》，既是精神抵抗的堡壘，也是懸於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在那個年代，甚至被金庸太太視為「裏通外國」的證據，父親與三個女兒的關係始終籠罩在政治高壓之下。親情被意識形態切割，家庭淪為階級鬥爭的微型戰場。

薛憶馮通過這一置換揭示殘酷真相：在極端政治暴力下，傳統「父慈子孝」的倫理結構被顛覆，取而代之的是基於階級的敵對關係。父親的「瘋狂」——或許是佯瘋，或許是真實崩潰——與李爾王在暴風雨中的呼號遙相呼應，都是對非人道秩序的悲憤控訴。他們的瘋癲，不是病理，而是清醒者在荒誕世界中的真實表達。

文學評論界常將一九七九年視為「傷痕文學」向「改革文學」過渡的節點，但在薛憶馮筆下，這一年承載更複雜的哲學意涵。對小說人物而言，一九七九年並非簡單的「春天故事」，而是一場劇烈的「顛倒」——不僅是命運的翻轉，更是價值體系的重構。

隨着政策落實，父親迎來「平反」曙光。那個曾經「很少說話」「幾乎沒有笑臉」的外公，突然變得興奮、滿臉笑容。這種「翻轉」表面是政治壓力的解除，實則是人性長期壓抑後的劇烈反彈。薛憶馮敏銳捕捉這種「顛倒」的雙重性：一是身份的顛倒——昔日的「階下囚」成為受尊敬的「老知識分子」，曾經的造反派則在歷史洪流中沉沒；二是價值的顛倒——曾被視為「毒草」的《李爾王》變為高雅文化象徵，昔日「正統」政治教條遭遇普遍質疑。

這種「顛倒」構成小說敘事的深層動力。父親試圖通過「回家」——重返城市、恢復名譽——來重建尊嚴。然而這種重建脆弱且充滿裂痕。正如李爾王恢復理智後仍面臨背叛與淒涼，小說中的父親在一九七九年後的「重生」，也無法抹去數十年精神創傷的烙印。平反不等於治癒，回歸也不意味着和解。

結構的迷宮：線性敘事與意識流的雙重變奏

《「李爾王」與一九七九》在文學形式上展現極高的藝術完成度。薛憶馮打破傳統家族小說的線性模式，採用「線性敘事與家族回憶交織」的複調結構。全書共三十三節，看似按時間推進，實則充滿意識流的跳躍與回環。敘述視角在「母親」、「父親」與「小外孫」之間靈活切換：第一節以母親視角切入，勾勒家庭歷史輪廓；中間部分通過父親回憶帶入驚心動魄的「前史」；結尾回歸父親視角，形成首尾呼應的環形結構。

這一結構不僅是形式創新，更是為「歷史記憶」主題服務。歷史從來不是直線，而是由碎片化記憶、情感褶皺與認知錯覺編織而成。薛憶馮借此讓讀者在「一九七九」的現實與「一九四九」、「一九六六」的過往之間穿梭，深刻體驗歷史對個體生命的持續傷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祖屋之災」的伏筆：第九章中，母親冷冷回憶父親關於外孫是否來鄉下的問題：「如果他還長着記性的話，肯定就不會願意。」這句看似隨意的對話，埋下了代際精神隔閡的種子，直至小說結尾才通過一場「精神交流」得以消解。

在眾多關於一九七九年的文學書寫中，少有作品如《「李爾王」與一九七九》般細致關注隔代人之間的情感糾葛。小說最動人的篇章之一，是「父親」與「小外孫」之間的關係演變。在特殊年代，小外孫於鄉下外公家度假時，偶然發現那本奇書《李爾王》。對孩童而言，滿頁英文如同天書，封面上的「李爾王」與「莎士比亞」成為認知世界的第一個謎題。

這種「隔膜」象徵着歷史記憶在代際間的斷裂。但薛憶馮並未止步於展示斷裂。在小說後半部，隨着小外孫成長與對歷史的重新理解，他與外公之間建立起一種深層的「精神交流」。這種交流不依賴言語，而是一種靜默的共情。當父親在一九七九年試圖通過回歸尋找尊嚴時，小外孫成了這段歷史的見證者與記錄者。這種「精神交流」超越具體恩怨，昇華為對人類普遍生存困境的關懷。

小說結尾，父親在為母親送葬的儀式上，看見水面上浮現出新娘羞澀的面孔。這一魔幻現實主義筆法，既呼應開篇母親回憶新婚的片段，也象徵一場遲來的「和解」。父親終於掙脫政治身份的桎梏，回歸到丈夫與男人的本真情感。這種基於愛與寬恕的「回家」，才是真正的精神救贖。

「李爾王」是中國的，還是人類的

薛憶馮曾言，他的寫作是「為了民族的忘卻」。《「李爾王」與一九七九》正是這樣一部對抗遺忘的文學實踐。它不僅是關於一九七九年的家族史，更是一部關於人類如何在劇變時代中守護尊嚴的寓言。他將莎士比亞的「李爾王」請進中國湖南的鄉間，讓其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歷史中受難、沉思與重生。

在這部作品中，我們看見歷史的暴力，也看見人性的韌性；目睹政治的「顛倒」，也感受愛的永恆。評論家稱其為「人性的百科全書」，實不為過。薛憶馮以精湛結構、犀利筆觸與深沉悲憫，為我們鎖定一段正在消逝的記憶，也指明一條通往精神家園的可能路徑。

在此意義上，薛憶馮筆下的「李爾王」不僅是「中國的」，更是「人類的」；一九七九年也不僅是中國的「改革元年」，更是人類在廢墟上重新尋找光明的共同時刻。
(作者為《深港書評》主編、文化記者。)

文化報人與時代同老的自度曲——評譚秀牧《我的回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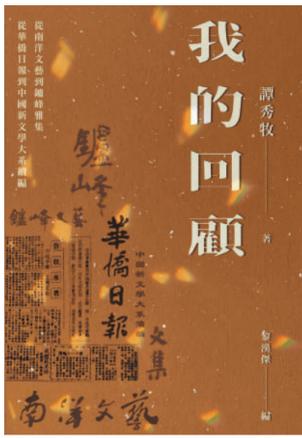
——黃冠麟

寫譚秀牧的故事很困難，主要譚氏為香港文壇巨匠，狠評惡惹來話柄。又在於他的多面性：《華僑日報》編輯、鐘峰雅集發起人、藝評人，每一個面向的譚秀牧都極具稜角，會「彈稿」、會頂撞上司、甚至被金庸太太視為「蛇王」之時，自帶一股怨氣。對於香港文藝界一些西學東漸、或者涉及挪用他人文字的現象，看不過眼的他會痛斥其非、用力阻撓。經《我的回顧》整理，全書可以見到譚氏的工作經歷可謂運道不佳。而又何幸，當年香港報界有足夠的包容，讓譚氏及一眾「頂頸」報人能夠受着工薪，鐵骨錚錚。

譚氏成書，並非約稿而撰，純粹於網絡平台上夫子自道，由心而寫，無須作偽。後得黎漢傑君洽編而成。亦因如此，少不了譚氏對於人與事看不過眼的牢騷。散文最能將人性之真表露無遺，但最過癮的一點，在於其見文明與理性非常，絕非「維園阿伯」式的指點江山，「假如我做的話一定掂」的豪言壯語一句都沒有。他做到在敘事唏噓、點評直接、主次分明，而又因為其原則先行、性格明顯、左評右評，讓此書讀之需帶骨下嚥，難稱暢快。不過，就如老派酒家的蒸排骨小點，帶骨的肉排有筋膜香氣，墊底的還有手工柚皮，滋味豐富。識食者珍之。老派酒家與香港報業命運相同，曾活過那麼一場燦爛，今又垂垂老矣。譚氏所工作過的報社，除《明報》外，今都已經一一結業停刊。鐘峰雅集，作為現當代香港文人交誼的平台，不少前輩亦大笑西去。譚氏是這一段文壇憶舊的參與者，此書也自然是這個時代的忠實紀錄。

忠實保留香港文化基因

譚秀牧編成此書時，恐怕早已預見到這是巫祝於末法時代的絕唱，所以他亦強調這是



「不二之選」。故友凋零，字裏行間浮動的，是整整三代香港文人的靈魂。走進共和，封建之下的司禮官，與典章文物同被掃入歷史塵埃前，還在努力書史。譚氏尖銳的批評、固執的堅持，對「文化版」、「副刊」稿件近乎迂腐的信仰偏執，在報業式微、網媒不校稿即可發的今日，顯得如此不合時宜，因此彌足珍貴。另一方面，這種高度交叉性，使得此書成為填補香港文學研究史的關鍵索引。譚氏作為參與者兼觀察者的雙重身份，記錄星馬作品在香港的傳播，是重要的史料補遺。當代研究者若欲解構「南洋—香港文學共同體」的形成，此書無疑提供了豐富線索。作為史筆，《我的回顧》最動人之處，恰在於其刺眼的忠實。文中那些未經修飾的抱怨與執念，還原出當時行業與時代的包容。這種帶刺的真實，恰是對「一人少一句」、「馬虎過到骨」、「和諧敘事」最有力的反諷。這種狀態之於今日，是隨時代進步而產生，還是文化人逼跪於金主，我們心中都有答案。

而即食文化橫行，誰還耐煩每周日到酒樓聚會，啃咬排骨？當人人都可以成為所謂的作家，當編輯風骨淪陷於刊文先看誰再考慮刊登的尷尬情況，《我的回顧》的存在，恰似最後一籠遵循古法製作的珍珠，固執地以不合時宜的姿態，為時代紀錄一些不合時宜的人和事，為香港保留着文化基因的原始樣本。這份忠實，終將在歷史的暗室裏，刻下永恆的愁思。

(作者為文化工作者。)

▲譚秀牧著、黎漢傑編《我的回顧》，香港：初文出版社，二〇二五年。
(資料圖片)

「文獻、文學與數媒：香港報章文藝副刊研究新探索」學術研討會召開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晚六點到十一點半，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課題「香港當代報章文藝副刊整理與研究（一九四九至二〇二二）」第六次學術研討會在線舉行。會議由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聯合審美文化與批判理論研究中心、粵港澳大灣區跨界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辦，來自兩岸三地高校的六十餘位師生圍繞「文獻、文學與數媒」主題展開研討。

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段吉方教授親臨致辭。段院長肯定該課題研究對深化內地與香港學術聯繫、服務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價值。課題首席專家、華南師範大學凌逾教授感謝學校和學院的大力支持，匯報項目進展情況，進入成果凝練與結項攻關階段，課題組系統整理香港報章文藝副刊，兼具文獻搶救與文化傳承雙重意義。

在子課題匯報環節，各團隊集中展示了階段性成果：華南師範大學張宇老師團隊編目工作已系統整理千萬字的史料；廣州理工學院張志國副教授與華南師範大學徐詩穎副教授系統匯報了團隊關於史論部分的撰寫框架與進展；香港中文大學何杏楓教授、丘庭杰老師團隊聚焦於跨界創意與港風敘事研究；華南師範大學侯桂新教授系統匯報了團隊「文化傳承與陸島共生」書稿撰寫進展；上海交通大學的龍其林教授團隊則關注報紙海外版的國際傳播實踐。隨後的青年學者研討環節中，課題組成員圍繞副刊的媒介空間、類型文學、都市書寫等方向展開探討，如對《大公報》版面「集納空間」的分析、《星島日報》海外版文藝副刊對嶺南文化的再現與重構等，展現出扎實的史料基礎與跨學科的學術活力。

在學術評議環節，深圳理工大學朱壽桐教授充分肯定了課題組將史料整理、理論探索與人才培養有機結合的模式，並對各子課題的具體路徑提出了優化建議。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南昌大學趙稀方教授建議研究應進一步聚焦報刊本體的歷史性梳理，以扎實史料為基礎構建歷史脈絡。香港文學史研究專家黃維樑教授在高度肯定課題基礎價值與團隊攻堅克難努力的同时，強調後續研究需嚴謹界定「文藝副刊」概念、聚焦香港性與世界性。

本次研討會標誌着該重大課題進入攻堅期，系列成果預計將為理解香港文學發展、豐富粵港澳大灣區人文研究提供關鍵性的學術支撐。

(通訊員 李永杰、蔡嘉洋、應一冉)

更多《明月灣區》內容可瀏覽：

《明報月刊》網站：<https://mingpaomonthly.com/gbaspecials>
《明報》網站：www.mpgba.com > 點選右上方「明月灣區」欄目

